

品读经典

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

——读《习近平在福建》

□曾丽琴

《习近平在福建》采访的对象既有其当年任福建省领导的班子成员,如陈明义、王一士、王建双等,也有当年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下属,如金能筹、林开钦、潘征等;既有跟他接触过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如林在禧、李非、王晶等,也有跟踪报道过他的新闻记者,如张红、黄世宏、孙永明等,可以说采访的对象与角度十分丰富。但这些采访对象各个风格不同的讲述,却都共同呈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独具一格的精神特质与在福建不同凡响的工作成就。

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意大利时曾深情地表达了他的“人民情怀”——“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事实上,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民情怀”在福建就已充分呈现了。王一士赞赏他:“习近平同志做一切工作都是以人民为中心”,黄瑞霖也谈到:“习近平同志有着为人民干一番事业的理想抱负”。黄世宏还非常清晰地记得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2000年第一次省政府党组会议(扩大)会议时所说的“牢记政府前面‘人民’两个字”这句话,他并以这句话作为那次新闻报道的主标题。

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受访者们谈到了许多习近平总书记具有深厚“人民情怀”的典型事例。其中像推动俗称“置民”的连家船渔民上岸与推动畲族茅草下山是多位受访者都印象深刻的。当时这两类群体生活都十分困难,“置民”们一家人生活在一艘小船上,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以船为家,终日漂泊,而闽东畲族群众的茅草房是每年台风、大雨都要被吹倒淋塌的。习总书记针对他们的实际实施了以上的“造福工程”,让他们改变世代代的贫困命运。张红评价说:“习近平同志有强烈的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并且他“宗旨意识特别强,有一种悲悯情怀,尤其是对基层的劳苦大众。”另外,像他2000年解决外来打工者上学难问题,2001年治理“餐桌污染”等等,无不具体而微地体现了习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当

然,“百姓省长”的尊称是福建人民对习近平总书记“人民情怀”最充分的肯定。

习近平总书记第二个让受访者由衷钦佩的是他的前瞻意识与胆略气魄。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主政期间抓了许多工作,其中“生态福建”建设、“数字福建”建设最能体现其前瞻与远见,“林权制度改革”最能体现其胆略气魄。

200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建设生态省的战略,并着手编制《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使福建成为全国首批生态省建设试点省份。黄瑞霖回顾当时的情景后说:“当时不少人连生态是什么都不清楚,甚至有人认为搞生态建设会影响经济建设”。而“数字福建”的提出更早两年,游德馨也回忆说:“当时网络尚未普及,很多人对电脑、互联网都不太了解,但是习近平同志高瞻远瞩,坚持建设‘数字福建’”。今日社会高度的信息化与全民环保意识的勃兴都在证明了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决策的前瞻性与正确性。陈明义认为这两个建设“对福建的长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采访时,受访者都对习总书记“生态福建”战略构想的提出颇感自豪,因为“福建的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起步早,而且力度很大”,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生态文明建设,新发展理念的绿色发展”与之是“一脉相承”的。

“林权制度改革”如今被誉为“我国农村第三次土地革命”。但改革之初,习近平总书记是冒着政治风险的,因为“分山到户是敏感的政治问题”。但习近平总书记义无反顾地在福建省展开了改革。黄瑞霖认为,习近平总书记这样做,“来自他对土地政治属性的深刻理解,来自他的‘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历史担当”,当然,“也足见他的胆略气魄和政治智慧”。事实上,由林权制度改革还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历史的深刻认识与对中国人民的深入了解。其他像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对经济建

设、统战工作、对台工作、双拥工作、科教事业、妇女工作、体育事业的支持与指导,《习近平在福建》这本书中都有充分的反映。这其中让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他对“晋江经验”的调研总结,对“福建土楼”命名的确定,对菌草技术发展的支持、对仰恩大学办学改制的说服、与外国企业家塚本幸司交往等事迹。这些事迹汇成了读者对习近平总书记胸怀宽广、格局宏大、眼光长远、涵养深厚、性格儒雅与能力非凡的立体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的胸怀、魄力、智慧与涵养,与他喜爱读书、注重调研这两个特点是分不开的。他的博览群书是连受访的学者都佩服的。学仕一身的汪毅夫就谈到他与习近平总书记在读书心得与学术上的交流。习总书记对很多书籍的熟知程度让他“大为叹服”,而他也将习总书记“视为一位志趣相投的‘书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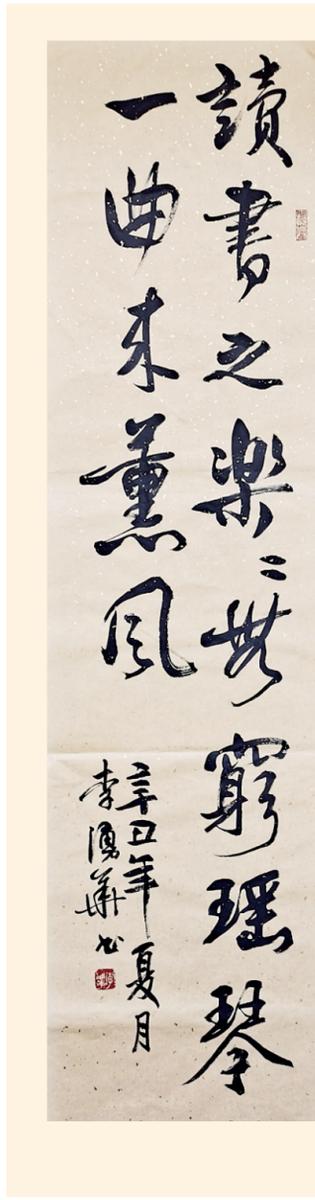
王一士则十分生动地讲述了习总书记深入调研的深入与辛苦:

他经常穿一身绿军装,脚上穿一双解放鞋。他多数时间都在基层调研考察,宁德地区所有偏僻的地方都去过了。在有些比较偏僻的地区,不仅没有路,甚至连羊肠小道都没有,需要披荆斩棘才进去。……有的时候要徒步走一天,吃饭的时候就蹲在荒山野岭吃口干粮、喝口水。在两年时间里,他走遍了宁德的山山水水。

黄瑞霖也感动地说,习总书记“踏足的一些非常偏远和闭塞的山村,有的甚至已经上百年没有县级官员进去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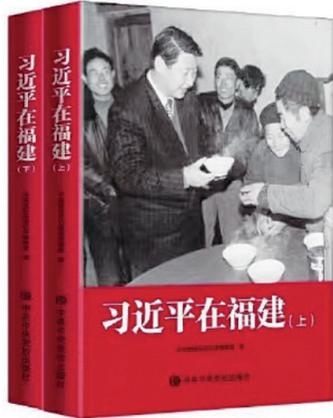
正是因为有这样辛苦与充分的调研,习近平总书记才能深刻地把握中国农村、中国社会的状况,才能写出《摆脱贫困》这部影响深远的著作,也才能根据中国的实际制定出像精准扶贫这样正确的一系列政策。

《习近平在福建》的35位受访者谈到的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往事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各自不同的记忆与理解。这35篇采访记录在整部书中既相互独立又彼此相关,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互文互义,不断回响,从而推动读者对习近平总书记人民情怀、执政理念与人格魅力理解的不断深入。这部书同之前5部采访实录一样,都是我们党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读者对这一系列采访实录的学习,既是党史学习,也是我们党铭记珍贵的历史资料。读者对这一系列采访实录的学习,既是党史学习,也是不断跟随习近平总书记回顾映照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中的一个过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些采访实录值得所有中国人一读再读,一学再学。



读书之乐无穷,瑶琴一曲来薰风

李浦华书



自2016年11月以来,中央党校策划组织了习近平总书记成长经历系列采访实录。这些实录先是在《学习时报》上刊出,后编辑成书。《习近平在福建》是这些采访实录的第六部。之前的五部分别为《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习近平在正定》《习近平在厦门》《习近平在宁德》《习近平在福州》。

《习近平在福建》分为上下两册,收入35篇采访记录。正如出版说明所言,这些采访记录“主要反映的是习近平同志先后任福建省副省长、省长期间的领导工作经历,是他在省域层面从事领导工作的真实写照”。当然,因为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的17年里,前面10年历任厦门市、宁德市、福州市的市领导,后7年先后任福建省省委副书记、省长等职,《习近平在福建》中的35篇采访实录亦肯定会涉及其在厦门、宁德、福州三市的任职经历,但侧重点当然在1995年任福建省领导之后。因是,《习近平在福建》这部采访实录就与《习近平在厦门》《习近平在宁德》《习近平在福州》三部采访实录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开卷有益

让英雄重现光辉形象

——《神秘的电波》的布局与叙述

□苏丽梅 文/图

得知黄水成的新书《神秘的电波》出版,很想有机会拜读,在回家的时候有幸获得他的赠书。

《神秘的电波》是一部红色少年长篇小说,全书12万字,以平和县长乐乡“南委事件”和“南委电台”作为原型,讲述罗云在求学的时候,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接受上级组织的安排,运用所学的知识,帮助独立团建立电台传递情报,在与敌人的战斗中,罗云机智、勇敢,和敌人斗智斗勇,几次化险为夷,不幸的是,由于内奸出卖,罗云被捕入狱,父亲变卖所有的家当要把他赎出去,罗云亦不为所动,最后壮烈牺牲。

本书分为28个章节,每个章节以四个字概括全篇,如“八面受敌”“夜半归来”“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等等,单看这些章节的小标题,就很让人期待,于是,迫不及待地要把这本书看完,方才罢休。

小说开头以诗意的语言,描述了一幅让人倍感压抑的画面,让读者一看开头就升腾起不祥之感:“一大群乌鸦从山脚下飞过来,黑压压地降落在那棵柿子树上,它们的喙啄红了一树的红柿子,啄红了1939年闽南深秋的太阳。”

乌鸦的出现,预示着不好的征兆,预示着一场血雨腥风的到来。独立团团团长金鸣代表中共闽粤边特委与国民党一七五师师长李东亮正式签订《政治协定》后,带着独立团和黄发奎所带领的闽粤边靖和独立大队会合,前往绥浦接受改编,中了李东亮的圈套,除了黄发奎带领一百多名独立团成员突围外,包括金鸣在内的其他人全部被捕……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大家措手不及,让独立团遭受重创,上级在分析原因后,意识到资讯及时传输的重要性,于是,有了“南方”电台的建立,有了罗云历史使命的肩负。

在这本书里,几个人物的刻画形象生动:罗云、赵丽君、黄发奎等,作者有意将人物放置在敌我双方的矛盾冲突中,放置在亲

情与乡情的关系里。罗富贵不惜送罗云外出求学,不惜和李东亮、赖县长搞好关系,只等罗云学成归来的时候,在他们那个一官半职,而知识的洗礼,教员马克思的影响,让罗云有了人生奋斗的目标,那就是为国家奉献自己的力量。在这个精神的引领下,罗云瞒着家里人成了“南方电台”的一员,并利用家庭优势,为电台工作的开展提供便利。在参加革命工作中,罗云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感人至深,而他在名利面前毫不动摇的精神更是难能可贵,在文章的最后,罗云不幸被捕入狱,罗富贵变卖所有家当,一心一意要帮他赎出来,他同样毫不动摇,最后英勇就义。在这里,一方面,是罗富贵对罗云寄予的深切厚望;一方面,是罗云献身解放事业的执着信念……

赵丽君,这位苦人家的女儿,在和罗云配合开展工作,机智勇敢,几次化险为夷,

为电台工作的开展立下大功。当赵丽君同样落入敌人手里时,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她的手指被钉满竹签,撕心裂肺的疼痛没有让她妥协,最后撞死在石柱上……

相比于金鸣的固执、武断,黄发奎显得更加谨慎小慎微,文章开头,在要去与李东亮会面的时候,黄发奎时刻保持警惕,并给金鸣几次提醒,无奈金鸣过于相信自己,最后酿成悲剧……

阅读本书,一股亲切感扑面而来,那漫山遍野的桃金娘浮现在眼前,唤起我儿时的记忆,而书中随手可捡到充满浓厚的闽南元素:瑄溪蜜柚、白芽奇兰茶、平和土楼、瑄溪城、九峰城、黄田堡、长乐秀山、南胜邦寮村等等。而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平和县长乐乡,作为一线新闻记者,黄水成对平和的一山一水都如数家珍,作家把对家乡的情感浸润在文字里,让读者读来倍感自然亲切,闽南元素的融入增添了事件的历史真实性。而红色文化、传统文化、客家文化、乡土文化的相互结合,让本书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还原历史的真实感。

《神秘的电波》由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为《台湾文学选刊》执行主编陈建安主编的“风展红旗如画·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儿童文学原创书系”之一。该书自2019年9月出版以来,好评如潮,获“2020年全国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如今已印刷5次,印数超3万册。黄水成说,他写这本书用了半年时间,两个月的构思,三个月的一气呵成完初稿,再用一个月时间进行修改。如果不是对素材的熟悉,不是对情节的掌握,是不可能在这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一部作品的。读者从全书的布局,从字里行间,时刻可感受到作家在用心书写。黄水成以他的深情,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故事;以他的虔诚,完成着这样一个使命:让神秘的电波,传递出错综复杂的革命故事,传递出感人至深的英雄情怀。

新书品评

对反思传统文化有所启发

——《古代中国的动物与灵异》译者的话

胡司德(Roel Sterckx)教授的《古代中国的动物与灵异》,是以先秦两汉文献中的动物资料为依据,通过动物观来透视古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著作。根据作者的自述,本书的写作宗旨与动物学史殊途异路,却受到了中国科学史研究,尤其是李约瑟的里程碑式成就的启发。就本书的问题意识而言,对古代中国动物观的文化探索,确是从回应“动物学在古代中国是否存在”这类科学史问题出发的。作者注意到古代文献中的动物资料既包含动物的信息,又透露人类的关切。因此全书所探索的问题就从“动物是什么”,转化为“动物是什么性质的对象”。如作者分析《周礼》对动物的诸多描述,总结道:“对动物物种的形式化描述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是由动物的社会性功用决定的,而不取决于动物的生物学属性。《周礼》中的自然界是博物学家研究的对象,而是行政控制的对象。”如果把动物作为对象的方方面面特性调查清楚,一定有助于呈现文化语境的某些信息。事实上这就是本书的兴趣所在。



如:动物总名与animal不相等,没有动物定义,没有动物学专著,没有学科概念,物种界线不清楚等等。这些结论无不是以另一种文明为参照,事实上有助于把“古代中国动物观”作为一个整体来了解。在作者看来,这些“无”,和古代文献中所能见到的“有”和“是”,往往是同样丰富的史料,有助于深入领悟特定文明的特点。

发现“无”并不是目的,关键毕竟还在于解释为什么“无”,或者说“有”的是什么。本书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核心概念是“道德”和“变化”。概括地说,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浑然一体的有机秩序,是本书对古代中国动物观的基本理解;而“道德”和“变化”的概念,则是对这种秩序的具体阐释。根据作者的分析,在古代中国的思想观念中,道德是对动物界和人类社会同时生效的力量,而持续不断的变化是动物界和人类社会共同的规则。如果这是对古代中国动物观的如实刻画,那么,自然的动物和文化的动物分不清,动物王国和人类世界融为一体,动物名含糊多义等现象就都得到了解释。到此为止,以现代动物学为参照模式所遗漏的种种内容就作为中心得到了突出,而衬托在动物学周围的背景,亦即古代中国思想世界的某些关键特征,也隐晦浮现了出来。

作者对“有”的浓墨重彩的说明,内在地蕴含着对“无”的解释。换句话说,本书所揭示的古代中国动物观的内容,也从反面解释了古代中国缺少原始动物学的原因。根据一般的理解,“德”为“力”之反,“变”与“常”相待。对物质力量的需求,对自然法则确定性的信念,乃是科学之所以产生的前提。本书的叙述却使人看到:如果维持动物界秩序靠的是道德感化,征服动物的物质力量就成了多余的,不可取的武力或蛮力;如果动物界秩序的特点在于“以变为常”,圣人的高明之处在于看透动物的变化和反常,“确定性”也就不值得寻求。既然不必凭借物质力量来征服外物,也无须依赖确定性的信念来认识外物,原始科学的

动物学无从得见也就可以理解了。“道德”和“变化”于是打通了身心间隔(物质与精神的间隔),融合了物我世界(客体和主体的世界),最终取消了把动物作为独立于人的对象来认识的愿望。作者所强调的这两个概念,实际上既突破了古代中国动物观的统摄天人的认知模式,也解释了动物学没有出现的原因。

总之,围绕自然知识的内容如何受文化和社会的塑造这一问题,作者描绘了一幅引人入胜的图景。尽管秉承价值中立的态度,无意在中西之间抑扬褒贬,不过本书的阐述和结论在中国读者看来可能对反思自己的传统文化有所启发。关怀传统文化来龙去脉的读者,当然不会只偏爱对本民族科学和文化的热情表彰。

本书的翻译始于2009年,那年我在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学院做访问学者,向胡司德教授提出了译介本书的建议,承他慨允并审阅了部分译稿。大部分工作是在2010年回国后进行的,到了全书修订告竣时,不觉已数历寒暑。拙译每成一章,辄以电邮发送胡司德教授,由胡教授在剑桥的中国学者和研究生的间征求意见,再集中反馈给我。这几位朋友的“匿名评论”订正了初稿的许多疏漏,解答了我的不少问题,令我受益匪浅。谨向胡司德教授和这些朋友的高情厚谊致以衷心感谢。

□蓝旭文/供图

相关链接>>>

胡司德(Roel Sterckx),剑桥大学“中国历史、科学与文明”李约瑟讲座教授,克莱尔学院院士。著作有《早期中国食物、祭品与圣贤》(Food, Sacrifice, and Sagehood in Early China),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年出版;主编《论鼎与品味:古代中国宗教与饮食文化》(Of Tripod and Palate: Food,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Traditional China),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兰出版社(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5年出版。撰有古代中国文化史及思想、宗教等方面论文及专著章节多种。2013年当选为英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作者简介

蓝旭,福建漳州人。1994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200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2009-2010年剑桥大学访问学者。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著作《东汉士风与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译著《古代中国的动物与灵异》(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发表过论文《论杜甫诗中的自适主题》《李白乐府的类型化与个别化》等。

